

John Keane 談民主：站在新時代 思考舊理想

內容出處 台灣智庫通訊第十七期
整理者 林啟驊 / 台灣智庫法政部研究專員
地點 台灣智庫

英國西敏寺大學教授 John Keane，被喻為該國最具前瞻性的思想家，同時也是世界級民主與市民社會理論學者。在台灣智庫邀請下，他於今年 5 月 31 日到 6 月 2 日間來台進行訪問，並與台灣學者進行多場妙趣橫生而引人深思的對話。到底這位受人注目的民主學者如何看待台灣的民主發展經驗？以下是 John Keane 教授在台灣談話內容摘要。

二十世紀是民主的世紀？

在二十世紀初期，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到達「選舉民主」（electoral democracies）的標準；只有 25 個國家被視為「有限民主」（restricted democracies），這只佔了世界人口的 12.4%。到了 1950 年，有 22 個國家（佔世界人口的 31%）享有民主制度，另有超過 21 個國家被視為「有限民主」（佔世界人口 11.9%）。直到二十世紀末，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下，全球 192 個國家中有 119 個被視為「選舉式民主」的國家（佔全球人口數 58.2%）。有人說，到了二十世紀，民主已經成為一種「全球人民所珍視的共同價值」。

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。特別是一些亞洲國家領袖如李光耀、馬哈地等人，便大力倡導「亞洲價值」，認為亞洲在傳統上重視穩定與和諧，傾向以集體價值而非個人價值來思考問題；相對地，西方所強調的「權利」只不過是自私自利，而政治多元更會帶來混亂和無效率。

放在充滿強權競奪的國際政治裡，民主價值更充滿爭議。特別是對於其背後有著美國軍事力量的支持，民主便蒙上一層曖昧渾沌的面紗。從亞洲的中國、馬來西亞、中東的伊拉克、黎巴嫩、東歐的南斯拉夫與南美的祕魯、委內瑞拉。許多左派的政治領袖公開指責美國的民主，認為美國不論何時都在建立民主圍牆，民主不過是一種帝國政府的型態，在這種政府裡「天空充滿著美國飛機，海上都是美國艦隊，他們的政體是英美的政體，而他們的國家安全則是為美國利益服務。」

各種對於民主的攻擊與辯護，本質上可能都是自我矛盾的說法。我們必須了解，所有社會體制都是以「人」為思考起點，換言之所有制度的基礎勢必建立在隨著時間不斷流動的沙土上。而民主作為人類生活領域中一種非常特殊的發明，意味著人民自我治理，亦即一群人透過議會討論程序來產生合法約束力，他們決定事務的權利不再是上帝所賦予的、也不是來自嗜血的暴君、或是交由擁有絕對權力卻不須經過任何限制的人來決定，而這正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價值。

新時代對於民主的挑戰與省思

撇開以選票決定政治權力誰屬的複雜手續，現代民主還面對許多挑戰，從網路科技到生物複製工程，都讓我們的生活出現許多新且痛苦的爭論，我們如何相信這些公共事務，會透過一定的討論程序來確保每個政策的正當性？從十九世紀以來，人們便發展出各種民主理論和程序，試圖透過各種粗糙的民主公式，來解決生活中的各種爭論。直到現代這種嘗試仍是無止盡的，部分原因是人們不清楚這些“畫在沙灘上的界線”何時會被權力的浪潮所衝垮。另一方面，人們也憂慮公共傳播媒體的發展，讓原本應該用來保護並養成民主政治的公眾氛圍，變成扭曲人性價值、摧毀體制的洪水猛獸。

我們必須體認，單純相信民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，民主不是在地球建立天堂的收據，也沒有層層疊疊的免疫系統，來保護其本身免於毫無顧忌的批判與挑戰。現代民主必須為本身的體制找到新的思想與可行有效的診治。

事實上，許多國家都在嘗試新的解決之道，例如芝加哥組成社區管理委員會，每個月利用「社區守望會議」（the beat community meetings）的方式，讓居民有機會參與，也讓警察知道其責任而謹慎使用權力。巴西也有參與預算制訂的形式，透過共同決定公共預算來提高城市居民改善公共設施的參與。這些革新或許都是地方性的，對於提升整體體制仍顯不足，但我們卻在其中看到不同形式的公眾參與，仍可以墾掘出民主價值中有許多重要的優點，像是謙遜、容忍、對法治的尊重以及對於非暴力的提倡等等，這些都有助於建立制度性多元主義、社會平等與多樣的公共責任機制，避免錯誤判斷下做成的決定、愚蠢的政策作為或是不作為。

台灣民主發展經驗的獨特性與價值

把台灣的民主發展經驗擺在整個世界民主發展史來看，可謂極為特殊的例子。台灣民主制度的建立與改革是自發自創而產生的，與日本、韓國接受美國扶植建立的民主不同。此外，台灣民主發展始終建立在一個高度世俗化（secular）的基礎上，而不像西方歐美國家的民主體系有著傳統天主教的深遠影響，將人權、自由、民主視為上帝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力。而在整個黨外抗爭的時代，台灣人民對於本身權益的爭取以及其後對於制度的設計與改革，始終立基於社會本身的需要以及政治力量之間的角力之上。西方歷史學者都應該要正視台灣民主的創新性。從前西方人總有偏見，不相信由西方發明的民主制度能在非西方世界有效實行，而台灣的例子不但證明了民主具有高度的普世性，而且也解構了「亞洲價值觀」的悖論。

儘管台灣的民主體系有其獨特性，但也存在著許多危機與挑戰。大概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：內部民主改革以及地緣政治上的憂慮。從客觀上，台灣雖然成功地從過去威權體制轉型成民主國家，但政府正當性方面仍有許多待解的難題。另外，國家外部也面對來自強鄰中國的軍事威脅，這兩者可謂互為因果。特別是面對中國因素，



台灣不能自滿於虛無的安全感中。儘管台灣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或許不會感覺特別恐懼，但這仍構成自身發展一個很根本的挑戰。例如美國在遭受 911 恐怖主義攻擊後，民眾才重塑了本身對於世界的認知。台灣人民也必須了解，唯有設法將自身鏈結在更大的國際安全體系下，台灣的民主才能獲得更大的保障。

另一方面，台灣與其他現存的民主制度一樣，並不需要一再創造新的工具來使民主運轉，反之應該學習民主精神並使之深化，這意味著更多的尊重以及自我謙遜，包括對法律、參與的期待、溝通的自由以及選舉的制度。民主只是一株脆弱的植物，公民社會是它的土壤，而尊重與謙遜則是它的肥料。台灣的民主鞏固，也不可能在內在溶蝕與外在威脅下坐待上天的賜福，唯有透過不斷地、積極地的實踐，才能自我完善。

John Keane 教授簡介

John Keane 目前任教於英國西敏寺大學政治系。他於 1989 年成立「民主研究中心」(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)，希望從政治、社會、文化面向探討民主議題。同時他也是「歐洲公民社會網絡工作」(European Civil Society Network) 成員之一，該組織目標在於大量累積歐洲公民社會跨國變動，以及未來發展的各項研究工作成果。John Keane 著作包括 *The Media and Democracy*(1991)、*Václav Havel: A Political Tragedy in Six Acts* (1999)、*Violence and Democracy* (2004)、*Global Civil Society?* (2003) 等書。2004 年他被倫敦時報喻為英國具前瞻性的政治思想家，而其著作則是「世界所不可或缺的」。最近的研究領域包括：全球政府、暴力與民主、公眾生活與溝通自由、十八世紀的共和主義、中歐與東歐的後共產政體 (regimes)、伊斯蘭的哲學與政治，目前正主持「民主的歷史」專案研究，試圖從全方位紀錄全球性民主的發展過程。此次訪問台灣，也是為了了解台灣的民主發展經驗。